

從私藏到公共展示—探討西泠印社社員參與 1929 年 西湖博覽會與文獻展覽會的社會形象及文化意義

From private collection to public display—Discussing the social
imag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Xiling Seal Society memb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1929 West Lake Exposition and
Documentation Exhibition

鄧君浩

Teng, Chun-Hao

華梵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摘要

筆者通過《申報》、《大公報》等資料，考察西泠印社社員參與 1929 年西湖博覽會，以及 20 世紀 30 年代開展的近代文獻展覽會的情況。筆者考察過程中，了解到西泠印社社員和早期贊助社員被委以設計委員或是徵集委員，反映出西泠印社社員在當時的社會形象。另外，從《大公報》刊載《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不僅刊登陳訓慈《浙江文獻展覽會之旨趣》，同版亦刊有張宗祥《五千卷樓隨筆》、沙孟海《浙江為印學總匯說》。筆者考察西湖博覽會展品，收藏家朱鴻達出品西泠四家印，以及趙之謙印章。而在吳中文獻展覽會，丁輔之出品兩方印章，特別是「文三橋七十二峰深處牙印章」。從《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也觀察到不少收藏家出品印章，其中有收藏家張魯庵，可知其早期藏印的鑒藏活動。筆者通過魏錫曾與友人沈樹鏞、丁丙的鑒藏活動，考察晚清私人收藏印章的風氣。而從丁輔之私人收藏印章到面向公眾展示，可看出從晚清私人收藏接駁到近代展覽會公共展示的情況。在 1929 年西湖博覽會，「秦石鼓影片」上附馬衡《石鼓考》，其學術成果傳播的層面，更擴及到社會公眾。

【關鍵詞】1929 年西湖博覽會、文獻展覽會、印章、社會形象、鑒藏

前言

由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1877-1950)主導的1929年西湖博覽會，為繼1910年晚清大員端方(1861-1911)倡議與促成的南洋勸業會後，在民國時期第一個全國性的博覽會，具有重要的歷史與文化意義。而20世紀30年代，江浙滬地區依序開展浙江、吳中、上海文獻展覽會，其開展的目的，近人研究歸結為：「傳承地方學術，反映區域文化特色，凝聚民族的自信心。」¹而1929年西湖博覽會與江浙滬地區開展的近代文獻展覽會，在地緣上與西泠印社及其社員相關。因此，本文考察西泠印社社員的參與，並展開探討社員參與的方式與身份，折射出在社會中的形象。另外，本文通過博覽會與文獻展覽會中公共展示的印章，考察其反映出的地域文化。最後，從社員的參與看其在文化與學術上的意義。

一、從西泠印社社員的參與看其在社會中的形象塑造

(一) 1929年西湖博覽會

1929年西湖博覽會，與位於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息息相關，在籌設西湖博覽會原提案的辦法中，提到：

會場利用沿西湖一帶公共場所及祠宇，如昭慶寺、蘇白二公祠、西湖公園、圖書館、平湖秋月、放鶴亭、西泠印社、岳王廟等處選擇借用。²

王佩智在《西泠藝報》中述及「古物保管委員會浙江分會」，曾提到：「巧遇1929年正在舉辦第一屆西湖博覽會，西泠印社、俞樓、廣化寺等處為衛生館。」³而近人古兆廷研究中，考察西湖博覽會的展館場地，發現藝術館與衛生館有更易的情況。在1928年12月3日舉辦的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會各館所籌備主任聯席會議第一次會議，將藝術館設於西泠印社、廣化寺、俞樓及寂庵等處，但在12月

¹ 周生杰，〈考文獻而愛舊邦——近代文獻展覽會推進地方文獻建設述略〉，《圖書館情報工作》，第55卷第23期（北京：《圖書情報工作》雜誌社，2011年12月），第140頁。

² 浙江省政府建設廳，〈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籌備西湖博覽會原提案〉，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16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1版），第57頁。

³ 陳振濂主編，《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長編》（杭州：西泠印社，2003年1版），第230頁。

13 日第二次會議中，卻將藝術館改設於照膽台、三賢祠、陸宣公祠等處，而將原為藝術館的西泠印社、廣化寺、俞樓及杜寓設為衛生館。⁴事實上，從筆者考察中，可知早在 1928 年 11 月 3 日的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會場務組第二次會議中，擬定藝術館館址為西泠印社、西湖工程處背後通路、廣化寺、俞樓及杜姓寂庵。⁵至於後來為何館址改易，目前資料尚不得而知。時人許士騏（1900-1993）參觀西湖博覽會後，為文刊登於《申報》，其中提及西泠印社時，說到：

西泠印社，為衛生館址。愚因部派來杭，參與其事。主任朱內光君，及總幹事沙古山、郭毓秀二君，經營擘劃，煞費苦心。社內亭閣樓台，各擅其勝，為湖中風物之最佳者，惜房舍參差，佈置殊難得體耳。⁶

另外，筆者通過《西湖博覽會衛生館參觀指南》，觀察到當時西泠印社亭台樓閣座落的位置，以及因應西湖博覽會而新造的設施，⁷可補充西泠印社早期文獻史料。而西泠印社將社址借浙江省政府作為西湖博覽會場館，也是一種化私為公的社會形象。

近人根據《申報》上的記載，述及西泠印社社員馬衡(1881-1955)被浙江省政府聘為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藝術館參事。⁸傅振倫（1906-1999）也曾為文提及馬衡在發掘燕下都時，因避其事端，乃回西湖為鄉邦籌辦西湖博覽會，後擴建為今日的浙江省博物館。⁹西泠印社社員中，不僅是馬衡參與籌辦西湖博覽會，另有社員丁輔之、葉為銘等人。筆者考察 1928 年 12 月 17 日徵集組第三次會議記

⁴ 古兆廷，《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1 月），第 17 頁。

⁵ 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1 版），第 223 頁。

⁶ 許士騏，〈參觀西湖博覽會歸來〉，《申報》（上海），1929 年 6 月 22 日，第 21 版。

⁷ 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參觀指南〉，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1 版），第 945-946 頁。

⁸ 古兆廷：《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1 月），第 59 頁。

⁹ 傅振倫，〈馬衡先生傳〉，《浙江學刊（雙月刊）》，第 3 期（杭州，浙江省社會科學院，1993 年），第 123 頁。

錄，其中一項是邀請本地金石書畫收藏家來會，並討論徵集金石書畫出品及保管事宜，且議決：

應先與收藏家王薌泉、胡穆卿（馬市街）、丁黼之（紫城巷葉品三轉）、周湘舫（天章綢緞莊轉）、王潛樓（剪刀巷）、俞福保諸先生接洽，再行召集討論辦法。¹⁰

以及在第八次會議中，討論徵求杭州市金石書畫古玩案，議決：「擬請主席添聘鄒景叔(1864-1940)、葉品三(1867-1948)、王竹人(1866-1950)三君為委員，佐助進行。」¹¹另外，在特種陳列所第二次參事會議，其中討論：「第十一次聯席會議議決各館所得直接派員分赴各地徵求出品，本所是否有派員赴各地徵求之必要。」並議決：「加請高魚占(1876-1960)、丁輔之(1879-1949)、葉品三三先生為本所參事後，再行推定專員赴各地徵集物品。」¹²近人研究中提到，在展覽期間，因戴季陶(1891-1949)參觀博覽會後，對於藝術館中一部分西畫表示不滿，以及中國藝術與古物出品太少的問題，導致藝術館改組。並根據《西湖博覽會總報告書》，可知館長制改為委員制，並裂為甲乙兩部，所有林館長（林風眠）(1900-1991)徵集之出品畫為甲部，乙部為鄒安任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徵集國畫金石，而葉為銘為乙部總幹事。¹³反映出西泠印社中人葉為銘的能力在當時備受倚重。

（二）近代文獻展覽會

20 世紀 30 年代，多地紛紛開展地方文獻展覽會，在江浙滬地區，筆者通過文獻考察，可觀察到西泠印社社員的參與。筆者通過《申報》，考察三地文獻展覽會的籌備與徵集訊息。浙江省文獻展覽會的籌備訊息，見於 1936 年《申報》，

¹⁰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1 版），第 216 頁。

¹¹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1 版），第 220-221 頁。

¹²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1 版），第 210-211 頁。

¹³古兆廷：《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1 月），第 48-51 頁。

可知組織辦法與概況，其中可見早期贊助社員孫智敏(1881-1961)與西泠印社社員高時顯(1878-1952)、葉為銘(品三)、陳錫鈞(1880-1961)等人的參與，筆者移錄於下：

分聘省內外熱心文教之學者及有名收藏家為設計委員，旋推定王孚川、余越園、錢均夫、孫廩才、邵裴子等五人為常委，經談話結果，分別函聘孫倬仁、項蘭生為書籍組整副主任，袁思永、高野侯為字畫組正副主任，鄒景叔、葉品三為古器物組正副主任，陳伯衡、顧鼎梅為金石拓片組正副主任，王孚川、李楚狂為革命文獻組主任，林風眠、陳萬里為圖片組主任，並依分會章程，以各區行政督察專員為正主任，而以當地有名學者為之副，外省則南京上海亦擬設徵品分會、刻正在接洽中。¹⁴

前人鉤沉浙江省立圖書館史料，陳述浙江省文獻展覽會時，也提到向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之機構與藏家徵求展品，並組織設計委員會，北平聘請馬衡、袁同禮(1895-1965)、沈兼士(1887-1947)、吳其昌(1904-1944)、邵伯綱(生卒年不詳)等為委員。¹⁵《申報》也提到：「此外並定在上海南京北平分設徵品分會，北平方面聞已請由吳雷川(1870-1944)、馬叔平二氏設法主持徵品。」¹⁶在 5 月 12 日馬衡致許紹棣(1900-1980)信中，可知浙江省教育廳聘請設計委員一事，信云：

貴廳來函內開本廳為闡揚本省文獻推進本省教育學術起見，定期舉行全省文獻展覽會，惟是項工作頗感艱鉅，計劃徵選端賴羣力，素仰執事精研學術，洞悉國故，愛護鄉土文物，尤具熱忱，用特專函敦聘担任設計委員共襄盛舉。除集議日期，另行函答外，附奉組織大綱、徵品辦法、緣起章程各一份，敬希察允等因。竊衡因院務殷繁，本鮮暇晷，加以輕材，難勝此任，惟念事關文化誼屬桑梓，不得不勉力負荷。¹⁷

¹⁴ <文獻展覽會之籌備>，《申報》(上海)，1936 年 7 月 20 日，第 10 版。

¹⁵ 宋晞：<陳訓慈與浙江省立圖書館>，錄自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浙江文史資料第 64 輯·史海鉤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 版)，第 54 頁。

¹⁶ <浙省文獻展覽會之籌備>，《申報》(上海)，1936 年 9 月 4 日，第 16 版。

¹⁷ 馬衡致許紹棣信札，錄自西泠印社美術館編：《先生歸來：馬衡和他的時代》，(杭州：西泠印

從信中，可知浙江省教育廳相當看重馬衡的學術能力，以及對國故與鄉土文物的認識。另外，從《申報》報導中，可知陳訓慈(1901-1991)到上海，假座西藏路寧波同鄉會召開上海徵品分會成立會，在設計委員中，就有丁輔之。¹⁸而南京徵品分會，也由陳氏在南京與沙孟海(1900-1992)、朱希祖(1879-1944)、柳詒徵(1880-1956)、程滄波(1903-1990)、童藻孫(1893-1969)等設計委員舉行會議，推朱家驊(1893-1963)、柳詒徵為南京徵品會正、副主任。¹⁹在 1936 年 11 月 3 日《大公報》刊載《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不僅刊登陳訓慈《浙江文獻展覽會之旨趣》，同版亦刊有張宗祥(1882-1965)《五千卷樓隨筆》、沙孟海《浙江為印學總匯說》等文章，²⁰而張宗祥與沙孟海分別為西泠印社社長。陳訓慈特別提到：「經數月之籌備，賴當代耆宿賢豪之指導，後許前邪，共相盛舉。」²¹在 1936 年 10 月 28 日截止的《展覽品應徵登記簡表（以收到先後為序）》，筆者初步考察西泠印社社員與贊助社員出品，如丁輔之、張閬聲、陳伯衡、孫廬才、葉品三、高野侯、高絡園(1886-1976)、吳東邁(1886-1963)等人。²²

在 1937 年 2 月舉辦的吳中文獻展覽會，從特刊內頁，可見馬衡的題詞「足資景仰」²³，從題名錄的徵集委員內，可見西泠印社社員丁輔之。在《申報》的報導，曾提到：「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主辦之吳中文獻展覽會，日來進行益力，各處應徵出品者，如北平、浙江、南京、鎮江、燕大各圖書館，西湖博物館以及各地藏家，如丁輔之、張菊生、回復庵等，均有精品參加。」²⁴筆者考察丁輔之出品的項目，有印章、書畫、尺牘、詩集等文物。

社出版社，2022 年 1 版），第 5 頁。

¹⁸ <浙文獻展覽會組設上海徵品分會>，《申報》（上海），1936 年 9 月 12 日，第 12 版。

¹⁹ 宋晞：〈陳訓慈與浙江省立圖書館〉，錄自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浙江文史資料第 64 輯·史海鉤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 版），第 54 頁。

²⁰ <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大公報》（天津），1936 年 11 月 3 日，第 12 版。

²¹ 陳訓慈：〈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號·序例〉，《文瀾學報》，第 3、4 期合刊，第 2 卷（浙江省立圖書館，1937 年），第 2 頁。

²² 《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浙江省立圖書館，1936 年）。

²³ 《吳中文獻展覽會特刊》，（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7 年）。

²⁴ <吳中文獻展覽會展期舉行>，《申報》（上海），1936 年 12 月 22 日，第 13 版。

而上海文獻展覽會籌備的訊息，也可通過《申報》得知。在 1937 年 5 月 11 日報導中，在「推定職員」中，可見馬衡、葉為銘、陳伯衡等人為名譽理事，而丁輔之為理事。²⁵在 5 月 23 日報導中，提到：

上海文獻展覽會，自決定七月二日在滬舉行展覽後，參加各縣均已積極準備。淞滬一帶，本為文物薈萃之趣，因向無聯合展覽之舉，故各縣文獻湮而不彰。現在一經提倡，即有許多珍品，與世人相見。除博物館與通志館，各將歷年收藏所得，亦已加以整理，準備出品外；其他藏家，如張菊生、丁輔之、王綏冊等數十人，亦已將所藏有關一市十縣之文物，全部準備送會。

26

而在 6 月 17 日的報導中，可知丁輔之等 14 人被推舉為鑑審委員。²⁷筆者考察《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觀察到其上所列理事人數遠比一開始《申報》報導《上海文獻展覽會昨召開發起人會議》人數多，而王福庵(1880-1960)也被列為理事之一，²⁸可見上海文獻展覽會從籌備到開幕，規模也不斷擴大。

經由筆者考察浙江、吳中、上海文獻展覽會，可見不少西泠印社社員的參與，特別是馬衡的學術身份，丁輔之的收藏家身份，以及陳伯衡、葉為銘專長在金石碑版，在徵集藏品上備受倚重，以及在鑒審方面的眼光，反映出西泠印社早期社員專業的社會形象。

二、從私藏印章到公共展示

1929 年西湖博覽會，在展覽期間，藝術館改組，分為甲乙兩部，而中國傳統書畫與金石的數量明顯大量增加。²⁹筆者考察博覽會中展示的印章及相關文物，

²⁵ <上海文獻展覽會昨召開發起人會議>，《申報》（上海），1937 年 5 月 11 日，第 11 版。

²⁶ <文獻展覽會各地珍藏應徵>，《申報》（上海），1937 年 5 月 28 日，第 11 版。

²⁷ 《申報》（上海），1937 年 6 月 17 日，第 15 版。

²⁸ 《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錄自上海文獻匯編編委會編：《上海文獻匯編·文化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 1 版），第 575 頁。

²⁹ 古兆廷：《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1 月），第 70 頁。

在原來林風眠主導徵集甲部的金石部份，列有「漢銅印」、「泥封」³⁰；而後來鄒安徵集乙部內的金石部分，列有「周舒王璽周厲王銀璽漢荊王璽」、「朱鴻達藏西泠四家刻印」、「朱鴻達藏趙撝叔刻印」、「吳氏竹松堂藏各種印章」、「朱鴻達藏田黃石章」。³¹另外，在《藝術陳列品研究報告二（乙部）》中，對文物進行解說，通過解說可以更了解展品的訊息。在印章部分，可知收藏家朱鴻達（1886-1970）出品西泠四家 67 方印，且藏趙之謙印章 12 方。³²對於清代浙江地區的篆刻藝術發展，西泠四家印人極具有代表性。晚清篆刻家趙之謙（1829-1884）在篆刻藝術方面的取法與造詣，以及在浙江印學發展中的定位，沙孟海《浙江為印學總匯說》提到：

咸同以來，浙中印學崛起者二家。會稽趙撝叔，辦香碩伯，更取資於羸劉權量泉布鐙鑑碑版之文，蔚然自闢一境界，雖魄力少遜，而韵味雋永，海內靡然嚮風，非無故矣。³³

1936 年沙孟海對趙之謙的評述「蔚然自闢一境界」，與在《印學史》所言：「今天看來，他一心開闢道路，打開新局，是成功的。」³⁴可以互為印證。

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號，載於《文瀾學報》，從學報所附的總目錄來看，應計畫分為上、下兩冊。據陳訓慈所言，因篇幅過鉅，所以爰先印上冊求正，下冊嗣出。³⁵而計畫載於下冊的金石，因《文瀾學報》停刊未及刊載，目前下冊也未

³⁰ 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參觀指南》，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1 版），第 918 頁。

³¹ 劉穎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續輯.7》，（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 年 1 版），第 1321、1323 頁。

³² 「朱鴻達藏西泠四家刻印」解說：「丁、蔣、奚、黃所刻印，錢唐丁氏所藏最富。此六十七方中奚、黃不乏佳品，固可與丁氏并傳耳。」；「朱鴻達藏趙撝叔刻印」解說：「撝叔不輕為人作印。此十二方，皆為傳節于（按：于應為子之誤）所作。傳、趙為金石交。宜其所刻印，皆精妙絕倫也。」，錄自劉穎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續輯.7》，（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 年 1 版），第 1323 頁。

³³ 沙孟海：〈浙江為印學總匯說〉，《大公報》（天津），1936 年 11 月 3 日，第 12 版。

³⁴ 沙孟海著；陳振濂導讀：《印學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 年 1 版），第 141 頁。

³⁵ 陳訓慈〈序例〉：「本編原擬合印專刊一冊，嗣以篇幅過鉅，殺青需時，屢承各方賢達，損書垂問，不敢久稽；爰先印上冊求正，下冊嗣出。」，錄自陳訓慈：《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號·序例》，

知藏地。³⁶所以筆者目前無法考察浙江省文獻展覽會中金石出品。而在 1937 年吳中文獻展覽會中，筆者通過《吳中文獻展覽會品名索引目錄》，考察出品的印章，其中丁輔之出品兩方印章，為「文三橋七十二峰深處牙印章」一枚、「顧云美刻傳是樓石章」一枚，³⁷特刊內頁也刊載這兩方印蜕（圖一）。丁輔之出品的兩方印章，不僅是展現了吳門地區篆刻藝術的發展，且在印學史上也相當具有代表性，特別是印人文彭(1498-1573)。文彭之父文徵明(1470-1559)在吳門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³⁸而文彭在篆刻藝術發展上的重要性，從沙孟海《印學史》所述，可知其影響之深遠。³⁹文彭「七十二峰深處」被收錄於近代多本印譜中，筆者依時間梳理，有高時敷輯《二十三舉齋印摭》於 1938 年成譜，⁴⁰及丁仁、高時敷、葛昌楹(1892-1963)、俞人萃(1897-1942)輯《丁丑劫餘印存》於 1939 年成譜，⁴¹又高時敷《樂只室印譜》成譜於 1944 年，⁴²而近代影印出版物又更多，可見此印圖像被廣泛流傳。至於丁輔之出品此印，是自己收藏，抑或是代高時敷出品，目前筆者還尚未得到相關文獻資料，無法作進一步考證。

丁輔之出品的另一方印「顧云美刻傳是樓石章」，在特刊中附有解說：「顧雲美為徐健庵刻傳是樓石。」在汪琬(1624-1691)《傳是樓記》說到：

崑山徐健菴先生，築樓於所居之後，凡七楹。間命工斲木為櫥，貯書若干萬卷，區為經史子集四種。經則傳注義疏之書附焉；史則日錄、家乘、山

《文瀾學報》，第 2 卷，第 3、4 期合刊（浙江省立圖書館，1937 年），第 3 頁。

³⁶ 陳訓慈等編；劉文龍整理：《浙江省文獻展覽會文獻敘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 年 1 版），第 15 頁。

³⁷ 《吳中文獻展覽會特刊》，（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7 年），第 1、14 頁。

³⁸ 柯律格：〈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與弟子和門人〉，《中國書畫》，第 10 期（北京：經濟日報社，2013 年），第 19 頁。

³⁹ 沙孟海著；陳振濂導讀：《印學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 年 1 版），第 87 頁。

⁴⁰ 陳振濂主編：《朱蛻華典：中國歷代印譜特展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 年 1 版），第 309-310 頁。

⁴¹ 丁仁、高時敷、葛昌楹、俞人萃輯：《丁丑劫餘印存》卷一，（上海：上海書店，1985 年 1 版），第 3 頁。

⁴² 陳振濂主編：《朱蛻華典：中國歷代印譜特展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 年 1 版），第 394-395 頁。

經、野史之書附焉；子則附以卜筮、醫藥之書；集則附以樂府、詩餘之書。⁴³

可見「傳是樓」是昆山徐健庵所築的藏書樓，且藏書豐富。此印不僅看出印人與藏書家的交遊，更反映出江蘇地區的藏書文化。

筆者考察《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觀察到「五、鄉賢遺物目」列收藏家出品的印章（圖二），吳湖帆（1894-1968）出品「畫禪室印（董其昌遺物）」、趙叔孺（1874-1945）出品「侯峒曾名印」「夏允彝紫晶印」、林爾卿（生卒年不詳）出品「王時敏鑒賞書畫牙印」……等多方印章，種類也包含牙章、石章、銅印等。⁴⁴從印目，可見文人用印，如室名、別號印、鑒藏印等，以及在此地活動的印人及其篆刻印章。筆者通過其上印章的考察，不僅可以了解此地篆刻藝術的發展，更可以反映出此地的文化背景。

張魯庵（1901-1962）在上海文獻展覽會不僅出品 19 本印譜，⁴⁵也出品在此地區活動的印人所刻印章。筆者通過上海文獻展覽會，考察出張魯庵早期藏印、藏譜的鑒藏活動，雖然在數量上不能與後來捐贈給西泠印社的印章、印譜相比，⁴⁶但可以補其收藏活動的全貌。

⁴³ [清]汪琬《傳是樓記》，錄自汪琬：〈堯峯文鈔〉卷 23，收自《欽定四庫全書》影印本。

⁴⁴ 《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錄自上海文獻匯編編委會編：《上海文獻匯編·文化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 1 版），第 637 頁。

⁴⁵ 鄧君浩：〈私人收藏印譜到公共展示：以 1937 年上海文獻展覽會為考察〉，錄自西泠印社編：《西泠印社王寅秋季雅集大印學·2，印學收藏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 年 1 版），第 95 頁。

⁴⁶ 根據〈捐贈書〉，葉寶琴提到：「本人現遵照先夫遺志，將其平生珍藏的歷代印譜孤本凡四百三十種，近兩千冊，秦漢銅印及歷代名家刻印珍品凡一千五百餘方，全部捐獻給國家，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貢獻一份微薄的力量。」，錄自王佩智，鄧京編著：《西泠印社藏品捐獻名錄》（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年 1 版），第 29 頁。



(圖一)《吳中文獻展覽會特刊》內頁，圖出自蘇州博物館古籍圖書館數字資料。

五、鄉賢遺物目			
號	名	出	者
6001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02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03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04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05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06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07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08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09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0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1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2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3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4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5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6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7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8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19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0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1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2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3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4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5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6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7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8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29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0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1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2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3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4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5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6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7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8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39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0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1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2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3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4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5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6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7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8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49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0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1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2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3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4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5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6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7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8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59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0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1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2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3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4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5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6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7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8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69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6070	明王士禛	王士禛	王士禛

(圖二)「五、鄉賢遺物目」，圖出自上海文獻匯編編委會編：《上海文獻匯編·文化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 1 版)，第 637 頁。

三、在文化與學術上的意義

(一) 晚清私人收藏印章到近代公共展示的轉變

晚清時期，在杭州、吳門、上海等地區，私人收藏風氣興盛，不論是搜訪書籍，以及古器物、碑拓與印章等文物，皆不容小覷。而私人收藏興盛，也往往成為學術上的支持，如開展出的金石學與印學。從收藏家的文集、著錄、詩集，可看出他們的收藏取向與愛好。筆者通過個案考察，探討活動於晚清的仁和魏錫曾(1828-1881)。⁴⁷過去的研究中，已對魏錫曾研究有一定程度的成果⁴⁸，其著有《論印詩二十四首》，序中云：

余夙有印癖，里居之日嘗與毛西堂、何夙明、朱芑孫、諤卿諸君手拓丁、黃、蔣、奚、二陳之作，裒然成譜，其他名家手製，別為一集。比歲游蘇常間，搜訪如前，聞見寔廣。⁴⁹

魏錫曾在日記中，也曾提到丁黃諸家印石，在同治六年正月廿六日日記說到：「早覓丁黃諸家數石不得，徧搜之，差誤記。已從季貺取歸也，懊悵不能作事。」⁵⁰另外，筆者通過魏錫曾與好友沈樹鏞(1832-1873)來往的書信，可觀察到兩人交遊中的印章鑒藏活動，以及當時藏印的風氣。在同治五年，寓居吳門的沈樹鏞致魏錫曾信中，提到花橋巷潘氏所藏舊印：

⁴⁷ 關於魏錫曾生卒年與活動，根據李軍考蘇州博物館館藏〈顯考稼孫府君行述〉。參見李軍：〈魏錫曾生平新証——以新發現的〈顯考稼孫府君行述〉為中心〉，收於李軍：《佣書讀畫錄》（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8年1版），第212頁。

⁴⁸ 林進忠，〈印學研究識見不凡的魏錫曾〉，《藝術學報》，第68期（新北：台灣藝術大學，2001年），第33-48頁；俞豐，〈魏錫曾研究〉，收於西泠印社編：《“百年印社·千秋印學”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03年1版），第320頁；王博，〈魏錫曾印學鑒藏活動考述〉，收於西泠印社編：《西泠印社壬寅秋季雅集大印學.2，印學收藏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杭州：西泠印社，2022年1版），第46-67頁。

⁴⁹ [清]魏錫曾：〈論印詩二十四首〉，錄自魏錫曾：《魏錫曾全集》《續語堂題跋》，《叢書集成續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原刻景印光緒癸未刊本）。

⁵⁰ [清]魏錫曾：《魏稼孫日記殘稿》，（上海：上海圖書館），無頁碼。

弟現寓花橋巷潘氏，伊家藏舊刻印甚多，如小松漢畫室、小松所得金石、鈍丁皆至精之品，曼生印尤多，旦晚當先屬遂生將小松兩印拓出，在兄赴閩之前必寄到也。⁵¹

在兩人信中，可知所藏印章、印蜕常常互通有無，彼此交換的情況。⁵²特別是魏錫曾故人的印章，沈樹鏞信中說到：「令郎即知松窗先生一印，弟甚愛之，然理當仍歸尊處。」⁵³關於松窗先生一印，魏錫曾曾提到：「黃小松先生為松窗、春松兩從祖刻名氏印，亦在此中，嗣有沈君韻初收得者。知未盡墮劫灰，然不可蹤跡矣。」⁵⁴

魏錫曾與杭州丁丙有書籍交遊，⁵⁵俞豐通過魏氏《書硯林印款後》，考察魏氏與丁丙交遊時間，可知兩人在同治四年交遊，且同有印癖。⁵⁶筆者考察魏錫曾《魏稼孫日記殘稿》，發現其與丁申（竹舟）、丁丙（松生）昆仲有書信來往，⁵⁷如同治六年正月一日日記記載：「燈下敬錄先祖遺詩一首，將寄松生入《杭州詩續輯》。」⁵⁸丁申、丁丙《國朝杭郡詩三輯》收有魏錫曾及其子魏本存詩數首，且著有小傳，反映出丁氏兄弟對其的了解：

⁵¹ 桑椹：〈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第三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80 頁。

⁵² 同治三年，沈樹鏞致魏氏信云：「丁龍泓十六印拓奉去，望檢收，不敢失信」；同治五年，沈樹鏞致魏氏信云：「許惠六家印拓，愈多愈妙，必須有款，能惠整幅最妙，否則零塊亦好。尤重在丁黃四家，茲將零塊已有者開明，望檢明即求惠寄，弟性甚急故也。」桑椹：〈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第三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74、81 頁。

⁵³ 桑椹：〈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第三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81 頁。

⁵⁴ [清]魏錫曾：〈硯林印款書後〉，錄自魏錫曾：《魏錫曾全集》《續語堂題跋》，《叢書集成續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原刻景印光緒癸未刊本），無頁碼。

⁵⁵ 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 年 4 月），第 55-56、168 頁。

⁵⁶ 俞豐，〈魏錫曾研究〉，收於西泠印社編：《“百年印社·千秋印學”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03 年 1 版），第 319 頁。

⁵⁷ 同治六年四月初五日提到：「接竹舟、松生二封」，錄自魏錫曾：《魏稼孫日記殘稿》，（上海：上海圖書館），無頁碼。

⁵⁸ [清]魏錫曾：《魏稼孫日記殘稿》，（上海：上海圖書館），無頁碼。

服官暇餘，一意金石之學，辯證考訂，至老不卷，青浦王氏《金石萃編》書漏百出，因撰刊誤若干卷，別撰《續語堂碑錄》以補其遺，又有《唐開成石經圖考》若干卷。……⁵⁹

魏錫曾與丁輔之的關係，從丁利年《丁輔之年表》提到，丁輔之誕生於杭州頭髮巷五號故居，母親魏氏為魏錫曾之女。⁶⁰而丁輔之對魏錫曾的認識，從其補錄魏氏詩作於魏氏手稿詩集內，⁶¹可見其對魏氏詩文有相當程度上的了解。過去的研究，據葉為銘《廣印人傳》，提到丁輔之“嗜印成癖”，⁶²顯然魏錫曾與丁輔之也有同癖（印癖）。從藏印方面，丁輔之也藏西泠八家印甚夥。

從晚清收藏家魏錫曾到活動於近代的丁輔之，可觀察到晚清私人收藏印章，往往是與友人間相互交流賞鑑。隨著近代文獻展覽會陸續的開展，私藏文物向公眾展示。丁輔之也經由吳中文獻展覽會，將私藏的印章向公眾展示，其中觀者的身份產生變化，並非自身的友人，而是進入了社會公眾的視野。從丁輔之將私藏印章面向社會公眾，可看出從晚清私人收藏接駁到近代展覽會公共展示的情況。

（二）學術成果面向公眾

前人研究中，認為西湖博覽會舉辦的理由之一為振興國貨，而籌備委員會在徵集展品時也屢屢強調徵集國貨。⁶³而過去的研究，也提到晚清所稱的「土貨」

⁵⁹ 丁申、丁丙編，杭州圖書館整理：《國朝杭郡詩三輯》第十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第535頁。

⁶⁰ 丁利年：〈丁輔之年表〉，錄自西泠印社編：《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創始人丁輔之研究暨“百年西泠·中國印”大型海選活動專輯》，《西泠印社》，第15輯（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7年），第33頁。

⁶¹ 丁輔之云：「右詩，此本未載，從真蹟錄入。戊寅八月，外孫丁輔之謹書，又與粵刻《續語堂詩存》校出未刻之詩，加以綠圈，詩一百一十四首詞一首，並此詩都一百十六首。」，[清]魏錫曾：《如心室未定草不分卷》，（上海：上海圖書館），無頁碼。

⁶² 卞孝萱：〈高時顯與丁輔之——〈四部備要〉輯校、監造人考〉，收於西泠印社編：《“百年印社·千秋印學”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03年1版），第88頁。

⁶³ 呂曉莉：〈張靜江與1929年西湖博覽會的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5月），第23頁。

到民初改為「國貨」，而「勸業會」也演變成「國貨展覽會」。⁶⁴近人也梳理了民國時期的「國貨展覽會」，本意在於通過比較、評審與獎勵促進國貨改良。⁶⁵這與蔡元培於 1929 年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題詞一致，他說到：

西湖山水明媚，每當春夏之交，遠近遊人聯翩紛集，凡百商業莫不於此時利市三倍。浙省政府利用此點，藉名勝之區設博覽之會，搜集貨品，分類陳列，將使游者流連勝景之時，目擊國產，辨其物品，識其產地，因比較而見優劣，由競爭而得進步，用以提倡國貨，激進工商設計至善。⁶⁶

而近人考察西湖博覽會出品給獎與藝術相關者情形，發現特等獎為都錦生絲織廠出品「五採紡繡」、中華琺瑯廠出品「琺瑯瓷器」、馬衡出品「獵碣考釋」，⁶⁷可見馬衡在 1929 年時的學術聲望與社會身份上都具有很高的威望。⁶⁸

傅振倫認為馬衡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其中之一即為《石鼓為秦刻石考》。⁶⁹而《石鼓為秦刻石考》此文，被刊登在 1923 年的《國學季刊》第 1 卷第 1 期。⁷⁰另外，在 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藝術陳列品研究報告二（乙部）》第六節「攝

⁶⁴ 古兆廷：《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1 月），第 7 頁。

⁶⁵ 馬敏，洪振強：〈民國時期國貨展覽會研究：1910—1930〉，《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8 卷第 4 期（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9 年），第 69-71 頁。

⁶⁶ 蔡元培：〈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題詞〉，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1 版），第 42 頁。

⁶⁷ 古兆廷：《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1 月），第 44、99 頁。

⁶⁸ 傅振倫：「馬先生當時是北大金石學教授及受聘為古物點查委員」，錄自傅振倫：〈馬衡先生傳〉，《浙江學刊（雙月刊）》，第 3 期（杭州，浙江省社會科學院，1993 年），第 123 頁。王幼敏：「1924 年參與清史善後委員會點查故宮物品，翌年十月故宮博物院成立，任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錄自王幼敏：〈馬衡與西泠印社〉，《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3 期（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2008 年），第 140 頁。

⁶⁹ 傅振倫：〈馬衡先生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3 期（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1985 年），第 120 頁。

⁷⁰ 王世民：〈馬衡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錄自王世民：《考古學史與商周銅器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 1 版），第 113 頁。

影」內出品的「秦石鼓影片」，解說為：

石鼓在國子監，文字拓本人多見之。此片攝十鼓真形，凹凸完損，如睹原物。攝影至此，嘆觀止矣。上附馬衡《石鼓考》，定為秦刻，亦瑣論也。⁷¹

可見「秦石鼓影片」上附馬衡《石鼓考》。馬衡《石鼓為秦刻石考》不僅刊載於《國學季刊》，又隨附展示於西湖博覽會，其學術成果也面向社會公眾。

結語

筆者通過《申報》、《大公報》等文獻，考察西泠印社社員參與 1929 年西湖博覽會，以及 20 世紀 30 年代開展的近代文獻展覽會的情況。從前人研究可知西泠印社曾被借用為西湖博覽會場館，籌備期間還有場館更易的情況。而筆者通過《西湖博覽會衛生館參觀指南》，從引導的路線，可觀察到當時西泠印社亭台樓閣座落的位置，可以補充西泠印社早期史料。另一方面，西泠印社將社址借浙江省政府作為西湖博覽會場館，也是一種化私為公的社會形象。

在考察中，了解到西泠印社社員和早期贊助社員被委以設計委員或是徵集委員，反映出西泠印社早期社員專業的社會形象。

筆者考察在西湖博覽會與近代文獻展會出品的印章，可知博覽會中收藏家朱鴻達出品西泠四家 67 方印，且藏趙之謙印章 12 方。而在吳中文獻展覽會，西泠印社社員丁輔之出品兩方印章，特別是「文三橋七十二峰深處牙印章」一枚，展現了吳門地區篆刻藝術的發展，且在印學史上也相當具有代表性。筆者通過《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觀察到「五、鄉賢遺物目」列收藏家出品的印章，可見文人用印，如室名、別號印、鑒藏印等，以及在此地活動的印人及其篆刻印章。其中張魯庵在上海文獻展覽會出品在此地區活動的印人所刻印章，可知其早期藏印的鑒藏活動。

⁷¹ <藝術陳列品研究報告二（乙部）>，錄自劉穎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續輯.7》（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 年 1 版），第 1334 頁。

筆者通過魏錫曾與友人藏印的鑒藏活動，可知晚清私人收藏的風氣。但從晚清收藏家魏錫曾到活動於近代的丁輔之，隨著近代文獻展覽會陸續的開展，私藏文物也面向公眾展示。丁輔之也經由吳中文獻展覽會，將私藏的印章向公眾展示，進入了社會公眾的視野，可看出從晚清私人收藏接駁到近代展覽會公共展示的情況。

在 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馬衡《石鼓考》隨附於「秦石鼓影片」。馬衡《石鼓為秦刻石考》此文不僅刊載於《國學季刊》，又隨附展示於博覽會，其學術成果的傳播，也擴及社會公眾。

參考文獻

- 周生杰，〈考文獻而愛舊邦—近代文獻展覽會推進地方文獻建設述略〉，《圖書館情報工作》，第 55 卷第 23 期（北京：《圖書館情報工作》雜誌社，2011 年 12 月）。
- 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1 版）。
- 陳振濂主編，《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長編》（杭州：西泠印社，2003 年 1 版），第 230 頁。
- 古兆廷，《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1 月）。
- 許士騏，〈參觀西湖博覽會歸來〉，《申報》（上海），1929 年 6 月 22 日。
- 傅振倫，〈馬衡先生傳〉，《浙江學刊（雙月刊）》，第 3 期（杭州，浙江省社會科學院，1993 年）。
- 〈文獻展覽會之籌備〉，《申報》（上海），1936 年 7 月 20 日。
- 宋晞：〈陳訓慈與浙江省立圖書館〉，錄自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浙江文史資料第 64 輯·史海鉤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 版）。
- 〈浙省文獻展覽會之籌備〉，《申報》（上海），1936 年 9 月 4 日。
- 西泠印社美術館編：《先生歸來：馬衡和他的時代》，（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 年 1 版）。

- <浙文獻展覽會組設上海徵品分會>，《申報》（上海），1936年9月12日。
- <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大公報》（天津），1936年11月3日。
- 陳訓慈：<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號·序例>，《文瀾學報》，第3、4期合刊，第2卷（浙江省立圖書館，1937年）。
- 《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浙江省立圖書館，1936年）。
- 《吳中文獻展覽會特刊》，（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7年）。
- <吳中文獻展覽會展期舉行>，《申報》（上海），1936年12月22日。
- <上海文獻展覽會昨召開發起人會議>，《申報》（上海），1937年5月11日。
- <文獻展覽會各地珍藏應徵>，《申報》（上海），1937年5月28日。
- 上海文獻匯編編委會編：《上海文獻匯編·文化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1版）。
- 劉穎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續輯.7》，（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1版）。
- 沙孟海：<浙江為印學總匯說>，《大公報》（天津），1936年11月3日。
- 沙孟海著；陳振濂導讀：《印學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1版）。
- 陳訓慈等編；劉文龍整理：《浙江省文獻展覽會文獻敘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年1版）。
- 柯律格：<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與弟子和門人>，《中國書畫》，第10期（北京：經濟日報社，2013年）。
- 陳振濂主編：《朱蛻華典：中國歷代印譜特展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1版）。
- 丁仁、高時敷、葛昌楹、俞人萃輯：《丁丑劫餘印存》卷一，（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1版）
- [清]汪琬《傳是樓記》，錄自汪琬：<堯峯文鈔>卷23，收自《欽定四庫全書》影印本。
- 鄧君浩：<私人收藏印譜到公共展示：以1937年上海文獻展覽會為考察>，錄自西泠印社編：《西泠印社壬寅秋季雅集大印學.2，印學收藏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年1版）。
- 王佩智，鄧京編著：《西泠印社藏品捐獻名錄》（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1版）。
- 李軍：《佣書讀畫錄》（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8年1版）。

- 林進忠，〈印學研究識見不凡的魏錫曾〉，《藝術學報》，第 68 期（新北：台灣藝術大學，2001 年）。
- 俞豐，〈魏錫曾研究〉，收於西泠印社編：《“百年印社·千秋印學”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03 年 1 版）。
- 王博：〈魏錫曾印學鑒藏活動考述〉，收於西泠印社編：《西泠印社壬寅秋季雅集大印學.2，印學收藏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杭州：西泠印社，2022 年 1 版）。
- [清]魏錫曾：〈論印詩二十四首〉，錄自魏錫曾：《魏錫曾全集》《續語堂題跋》，《叢書集成續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原刻景印光緒癸未刊本）。
- [清]魏錫曾：《魏稼孫日記殘稿》，（上海：上海圖書館）。
- 桑椹：〈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第三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
- 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 年 4 月）。
- [清]魏錫曾：〈硯林印款書後〉，錄自魏錫曾：《魏錫曾全集》《續語堂題跋》，《叢書集成續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原刻景印光緒癸未刊本）。
- [清]丁申、丁丙編，杭州圖書館整理：《國朝杭郡詩三輯》第十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 年）。
- 丁利年：〈丁輔之年表〉，錄自西泠印社編：《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創始人丁輔之研究暨“百年西泠·中國印”大型海選活動專輯》，《西泠印社》，第 15 輯（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7 年）。
- [清]魏錫曾：《如心室未定草不分卷》，（上海：上海圖書館）。
- 卞孝萱：〈高時顯與丁輔之——〈四部備要〉輯校、監造人考〉，收於西泠印社編：《“百年印社·千秋印學”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03 年 1 版）。
- 呂曉莉：〈張靜江與 1929 年西湖博覽會的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 5 月）。
- 馬敏，洪振強：〈民國時期國貨展覽會研究：1910—1930〉，《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8 卷第 4 期（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9 年）。
- 蔡元培：〈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題詞〉，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1 版）。

- 王幼敏：〈馬衡與西泠印社〉，《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2008年）。
- 傅振倫：〈馬衡先生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1985年）。
- 王世民：〈馬衡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錄自王世民：《考古學史與商周銅器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版）。